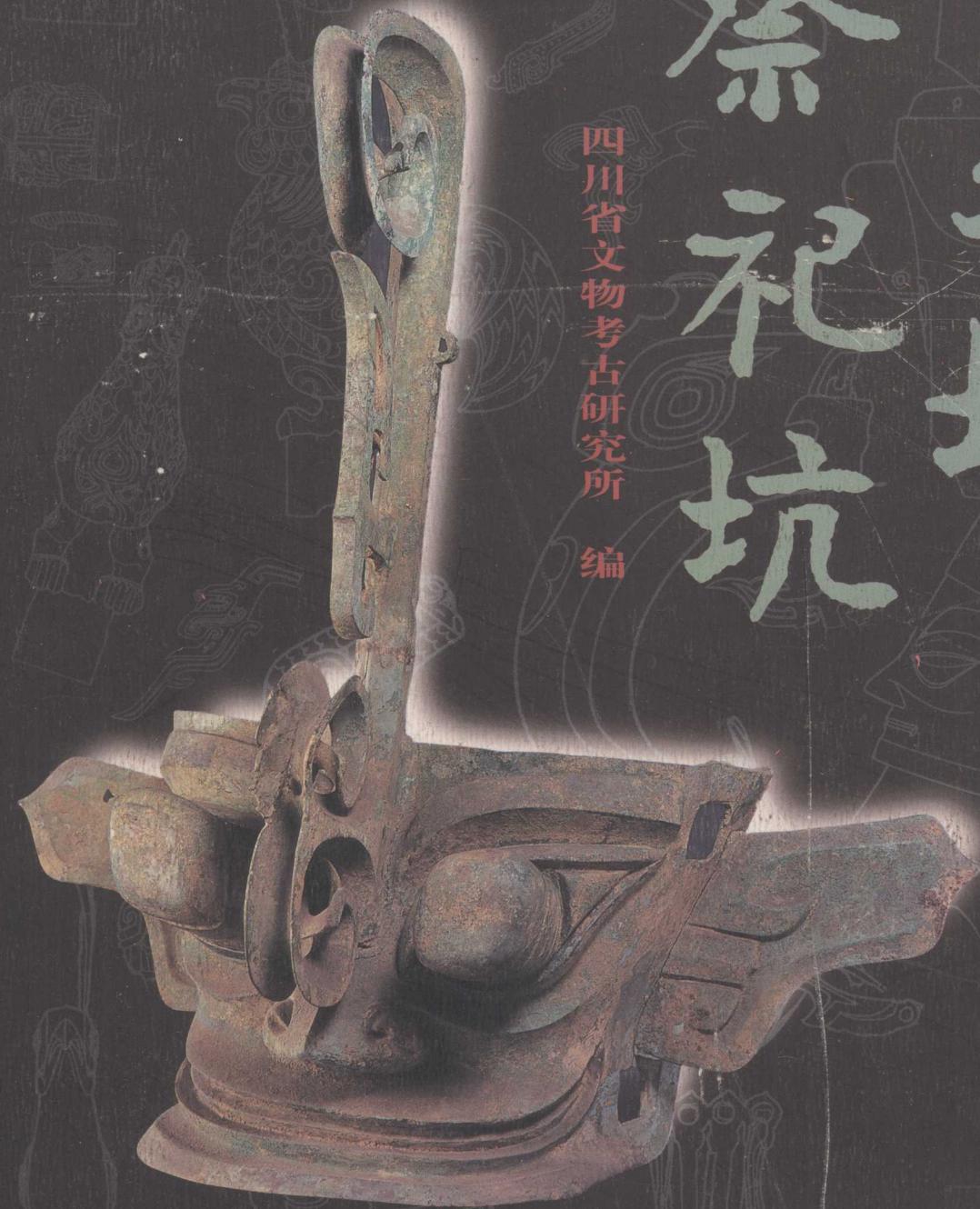


三星堆 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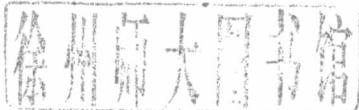


Excavation of the Sacrificial Pits at Sanxingdui

K8B.05 / 1263555
/ /

三星堆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22652322

3555

文物出版社

书名题写 张政烺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李 莉
黄文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星堆祭祀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4
ISBN 7-5010-1032-3

I . 三… II . 四… III . 蜀(古族名) - 祭祀遗址 - 发掘报告 - 四川 IV . K87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6090 号

三星堆祭祀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东莞新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39.5

1999 年 4 月第一版 199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032-3/K·428 定价:360 元

Excavation of the Sacrificial Pits at Sanxingdui

Compiled and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Sichuan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999

目 录

序	7
壹 前言	9
贰 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与清理经过	12
叁 一、二号祭祀坑在遗址中的位置	15
肆 一号祭祀坑	16
一 发掘概况	16
(一) 层位关系	16
(二) 祭祀坑形制及相关遗迹	19
(三) 埋藏情况	19
二 出土遗物	23
(一) 铜器	23
1. 人像	23
2. 面像、面具	26
3. 龙、虎饰件	33
4. 礼器	33
5. 仪仗	54
(二) 金器	60

(三) 玉器	61
1. 礼器	61
2. 仪仗	82
3. 工具	96
4. 其他	117
(四) 石器	121
1. 仪仗	121
2. 工具	132
3. 其他	145
(五) 陶器	145
(六) 骨器	150
(七) 象牙	150
(八) 海贝	150
伍 二号祭祀坑	154
一 发掘概况	154
(一) 层位关系	154
(二) 祭祀坑形制及相关遗迹	157
(三) 埋藏情况	157
二 出土遗物	158
(一) 铜器	162
1. 人像	162
2. 人面具、兽面具、兽面	182

3. 眼形饰、眼形器、眼泡	201
4. 神树、神坛、神殿、太阳形器	214
5. 礼器	238
6. 仪仗	283
7. 挂饰	289
8. 铜箔饰件	315
9. 杂件	325
(二) 金器	352
(三) 玉器	354
1. 礼器	354
2. 仪仗	368
3. 工具	385
4. 饰品	405
5. 其他	405
(四) 绿松石	406
(五) 石器	406
1. 礼器	406
2. 仪仗	411
(六) 象牙、象牙珠、象牙器残片、虎牙	413
(七) 海贝	419
陆 年代与分期	424
一 年代	424

(一)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与分期概况	424
(二)	两个祭祀坑的地层年代	427
1.	一号祭祀坑的地层年代	427
2.	二号祭祀坑的地层年代	427
(三)	一、二号祭祀坑的年代推断	427
1.	一号祭祀坑的年代推测	427
2.	二号祭祀坑的年代推测	429
二	分期	432
(一)	铜器的分期	433
(二)	玉石器的分期	433
柒	结语	438
一	对两个祭祀坑族属问题的推测	438
二	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问题	440
三	有关蜀人宗教礼仪制度的探讨	442
(一)	类别与功能	442
1.	神像、神灵	443
2.	巫祝类	443
3.	祭祀用器	444
4.	礼器	445
5.	仪仗	446
6.	祭品	446
(二)	祭祀方式	446

(三) 祭祀对象	447
四 文化结构分析	447
捌 附表	449
一 一号祭祀坑出土铜人头像统计表	449
二 一号祭祀坑出土铜瑗统计表	450
三 一号祭祀坑出土铜戚形方孔璧统计表	452
四 一号祭祀坑出土铜戈统计表	453
五 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璋统计表	455
六 一号祭祀坑出土玉戈统计表	457
七 一号祭祀坑出土玉斧统计表	458
八 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凿统计表	459
九 一号祭祀坑出土石戈统计表	461
十 一号祭祀坑出土石斧统计表	463
十一 一号祭祀坑出土陶尖底盏统计表	464
十二 一号祭祀坑出土陶器座统计表	465
十三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人头像统计表	466
十四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人面具统计表	468
十五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兽面统计表	469
十六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眼形器统计表	470
十七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眼泡统计表	473
十八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容器统计表	474
十九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瑗统计表	475

二十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戚形方孔璧统计表	477
二一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戈统计表	478
二二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铃统计表	479
二三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圆形挂饰统计表	481
二四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龟背式挂饰统计表	482
二五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扇贝形挂饰统计表	483
二六 二号祭祀坑出土玉璋统计表	485
二七 二号祭祀坑出土玉戈统计表	486
二八 二号祭祀坑出土玉凿统计表	487
玖 后记	489
拾 附录	490
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	490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岩石类型薄片鉴定报告	500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器残片鉴定报告	515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观察	522
拾壹 彩图	523
插图目录	587
拓片目录	604
图版目录	607
彩图目录	622
Abstract (英文提要)	626

序

邹衡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是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和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自该祭祀坑发现和公布以来，考古学界对这批重要材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面对如此丰富的出土文物，修复和整理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尽管先期发表的两篇简报只公布了有限的资料，却就此涌现出了大批的研究论文。研究者们对于三星堆祭祀坑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出土器物的功能、埋藏的性质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出现了诸多分歧的意见。大家急切地企盼着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早日出版，以便完整而全面地了解这批考古材料。现在，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终于大功告成，让我们共同庆贺这一丰硕成果的公诸于世吧。

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现象十分别致，器物种类丰富多样。“倾倒”在两个长方形土坑里的大量金、铜、玉、石、陶、象牙等质地的器物，大多经过有意的焚烧与破坏。器物的种类，除少量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容器和当地遗址中常见的陶器而外，还有许许多多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铜神像、人像、树木等。前所未见的埋藏现象和首次发现的新颖器物，使人觉得这两个坑既不像一般的墓葬，也不似常见的窖藏，因而发掘者将两个坑命名为祭祀坑。但另一些学者仍然提出了火葬坑、亡国宝器坑等不同的意见。无论哪种意见正确，三星堆两个坑的埋藏现象不见于中原及中原周边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埋藏性质尚未最后解决之前，报告中称之为祭祀坑是可以的，应当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个坑的用途就一定是为了某种祭祀活动。不管是否用于祭祀，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和先秦史上的重要性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的。

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在于坑中出土大量各种质地的高品级的文物，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不仅为确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提供了许多可供类比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四川盆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而且为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追溯古蜀国的历史提供了线索。大家知道，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四川盆地西部是古蜀国的疆域，战国以前的早期蜀国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认识早期蜀国的历史，有赖于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和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三星堆祭祀坑里不少新材料，可以同文献中关于蜀国的记载发生联系，如巨大的铜鸟头和众多鸟的形象，凸目的铜神像和大批的铜眼睛造型，金杖上双鸟和双矢射鱼所标志的王者形象，都与蜀王世系传说中的蚕丛、鱼凫等有关系。正是依据这些材料，报告作者及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两个祭祀坑是古蜀国的遗存，三星堆文化属于蜀文化。

三星堆祭祀坑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据报告作者说，祭祀坑所在的三

星堆本是人工堆筑的土台，在它的周围分布有 12 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遗址围绕着边长约 1800~2000 米左右的宽大的堆土城墙。从城址的规模来看，与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不相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中国西南部的这一古国是何等气派。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巨大的中心城址也不是一座孤岛，在三星堆遗址以外的广汉、新都、彭县等地还有数十座同时期的中小遗址。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由中心城邑、一般邑聚和村落组成的复杂社会。处在该文化分布区中心的规模最大的城邑三星堆遗址，很可能是这个复杂社会的都城。这个都城的名字，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确定，但是，广汉古名“雒城”，遗址旁的大河古名“雁江”（今名鸭子河），似乎也与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国都邑“瞿上”有着蛛丝马迹的联系，不排除这些地名可能有着前后发展演变的关系。

即便在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文化的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三星堆祭祀坑也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从龙山文化时代起，在黄河流域、山东半岛和长江流域就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新石器文化或铜石并用文化的中心。在这些地区普遍出现了绕以夯土或堆土城墙的古城，出现了巨大的祭祀建筑和相当规模的墓葬，拥有高度发达的制玉和制陶工艺，有的地区还掌握了早期的铸铜技术。四川盆地在这一时期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宝墩村文化也出现了多座古城和大型祭祀性建筑，其发达程度似乎并不低于中原地区。然而，龙山文化时代晚期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原周边不少原先颇为发达的区域文化陡然衰落，中原青铜文化开始崛起，先进的青铜冶铸工艺伴随着中原早期王朝势力的扩张而向周边传播与辐射。由于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在中原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系列既具有中原文化因素又具有当地特色的青铜文化，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大家知道，中原青铜文化在商文化的二里冈上层时期分布范围最为广阔，从那以后，商文化开始萎缩，周边的地方文化却因此走向强盛和繁荣。在长江流域，大量青铜器的出现恰好都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若干集中出土铜器的地点，如江西的清江县和新干县，湖南的宁乡县，陕西的城固县和洋县等，三星堆祭祀坑也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出现的。这些历史现象，在我们思考中原商王朝与南方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时，会得到新的启迪。

就这本三星堆祭祀坑报告而言，我认为编写是相当成功的。它不仅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所有的材料，而且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并解决了不少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在报告正文之后，还附录了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玉石器岩石类型薄片鉴定、玉器残片鉴定和动物骨骼观察等报告，从而构成了一部考古报告应该具备的完整体系。毫无疑问，这两座祭祀坑发掘报告的出版，将极大地推进三星堆文化及四川青铜文化的研究，为探讨早期蜀国历史提供大量的新资料。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和先秦史的研究也将因此写出新的篇章。

是为序。

1997 年 10 月于北京颐和园后

壹 前言

广汉市位于川西平原北部，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市约41公里。

川西平原北部，系沱江上游一系列冲积扇连接而成的冲积平原，其东南缘是龙泉山山脉，西边是岷山山脉南麓茶坪山，北面有石亭江、绵远河南来，西北面鸭子河、马牧河、蒙阳河蜿蜒向东南，最后在广汉市南面汇入沱江（图一）。这一带河流密布，沟渠纵横，平原多被河流切割成脊背状阶地。在河流两岸阶地上，较为密集地分布着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1]（图二）。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北面^[2]，东距广汉市政府驻地“雒城镇”约8公里。遗址主要部分在南兴镇所辖的三星、真武、回龙三个自然村以及三星乡所辖的仁胜、大堰两个自然村境内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两岸阶地上，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图三）。

1931年，遗址北部的真武村农民燕道诚在其宅旁掏沟车水溉田时，挖出玉石器300余件，不久流散于世。前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 C. Graham）、襄理林名均等闻讯后前往调查，并于1934年做过试掘^[3]。1956年春天和秋天，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田野考古组王家祐、江甸潮在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了真武村横梁子和三星堆一带的文化堆积，由于不知这两处遗存同为一大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将南北两处的文化堆积分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4]。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结合考古课的教学实习，对上述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命名为“中兴古遗址”^[5]，并于1963年配合考古专业六〇级的教学实习，与四川省博物馆联合进行了发掘^[6]。1980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当地砖厂取土，与广汉市文化馆、文物管理所联合，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7]。其中，1986年3月至5月的发掘，是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配合八四级考古专业的教学实习联合发掘的。1988～199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又先后对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三面的城墙进行了四次发掘。1980～1994年期间，先后发掘面积共约5000余平方米。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四川省广汉市文管所、什邡县文管所《四川广汉、什邡商周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2] 南兴镇原名“中兴乡”，1980年改名南兴乡；1986年撤乡建镇，现为南兴镇。

[3] a. 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VI, 1933～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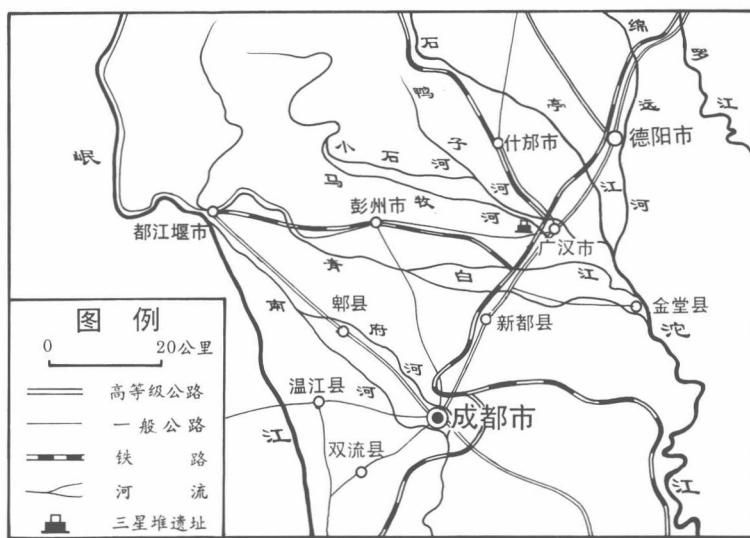
b. 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渝版1号）3卷7期，1942年。

[4] 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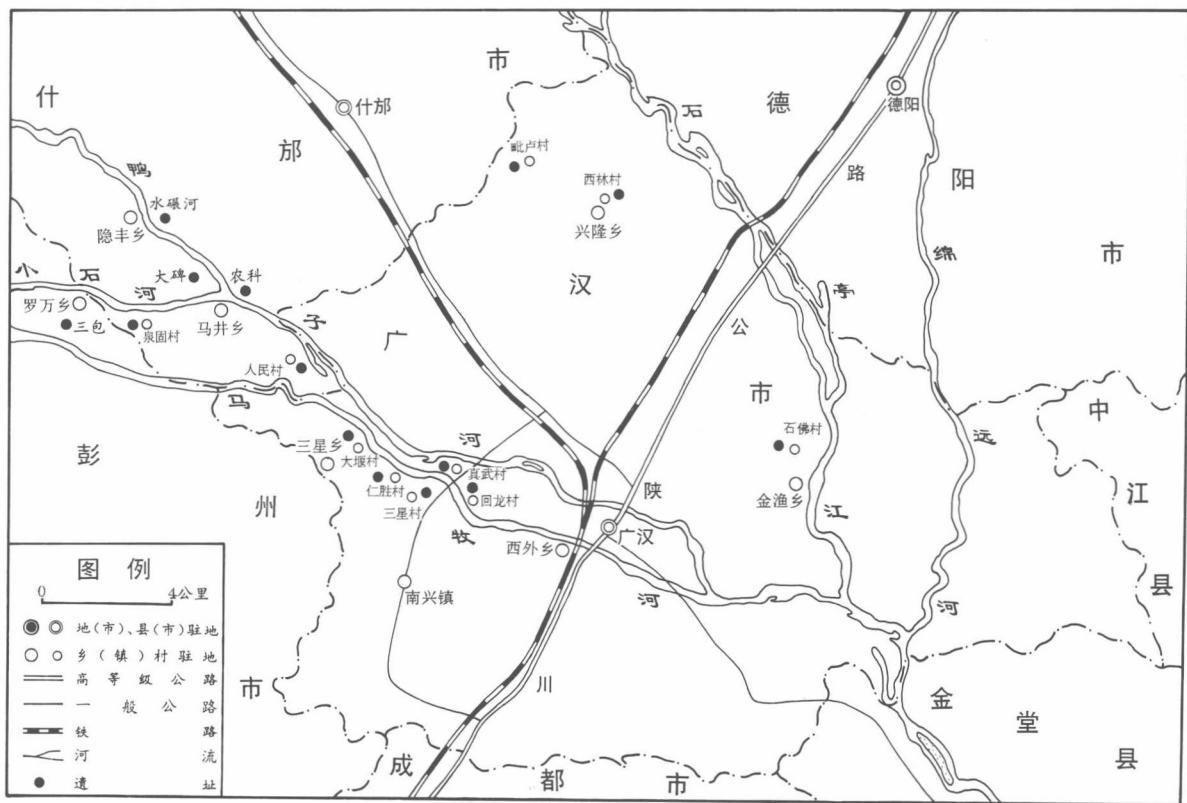
[5]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6]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19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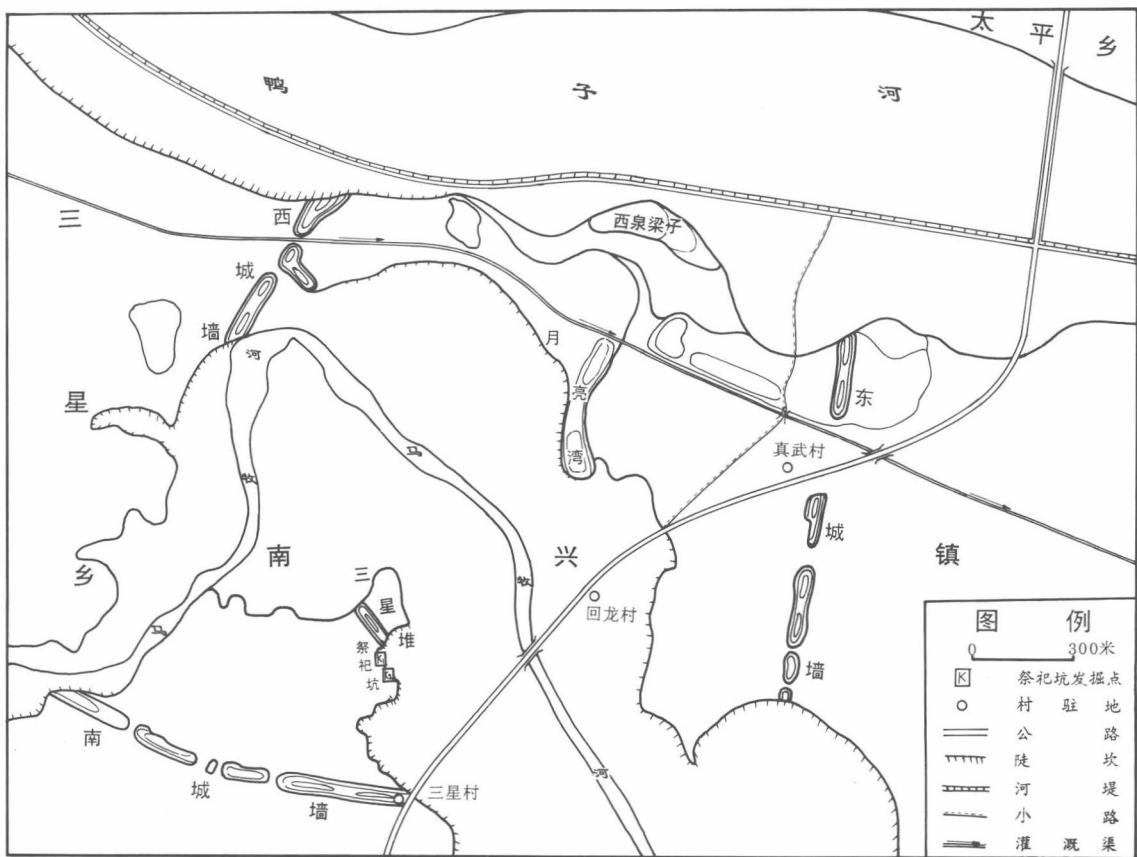
[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图一 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商周遗址分布图



图三 三星堆遗址分布图

贰 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与清理经过

三星堆遗址的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都是在当地砖厂取土制砖中发现的。

在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分布着长数百米至千余米、宽40余米的土埂。东面的土埂和西面的土埂均呈一直线分布，南面的土埂略呈“V”形向外拐折。这些土埂经近年的多次试掘后被确定为城墙^[8]。在南城墙以北的城内，也有一条土埂（与南城墙平行），长约200余米，其上有两个缺口，将土埂分割为三段，当地称之为“三星堆”。东城墙和西城墙由于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之间，当地农民称作“横梁子”。1985年，我们规划当地砖厂取土地点时，在调查勘探中初步了解到“三星堆”土埂和遗址东西两面的“横梁子”土埂都是人工垒筑的，怀疑是遗址年代范围内的城墙，因而撤销了砖厂原来把三星堆作为取土对象的计划，暂时指定三星堆一带以外文化遗物较少的地方作为取土地点。后来发现那些地方也有文化堆积，于是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抢救性发掘。1986年春，配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教学实习，对三星堆周围有文化层的地方进行了1000余平方米的发掘，共分三个发掘区，编号为86GS I~III（图四）。4月初，在第二发掘区（即后来发现祭祀坑的东南面）发现了两处土坑，坑内均出土了零星的铜器、玉石器、烧骨和灰烬。当时将这两个土坑疑为墓葬，推测这一带文化层分布较薄的地区是墓葬区，并停止了在这一带取土的方案。因砖窑建在遗址内，附近无其他土可取，虽然我们提出砖厂拆迁的建议，但由于省、市政府一时还未落实拆迁经费，故仍有少数砖厂职工在这一带继续取土，以暂时维持砖厂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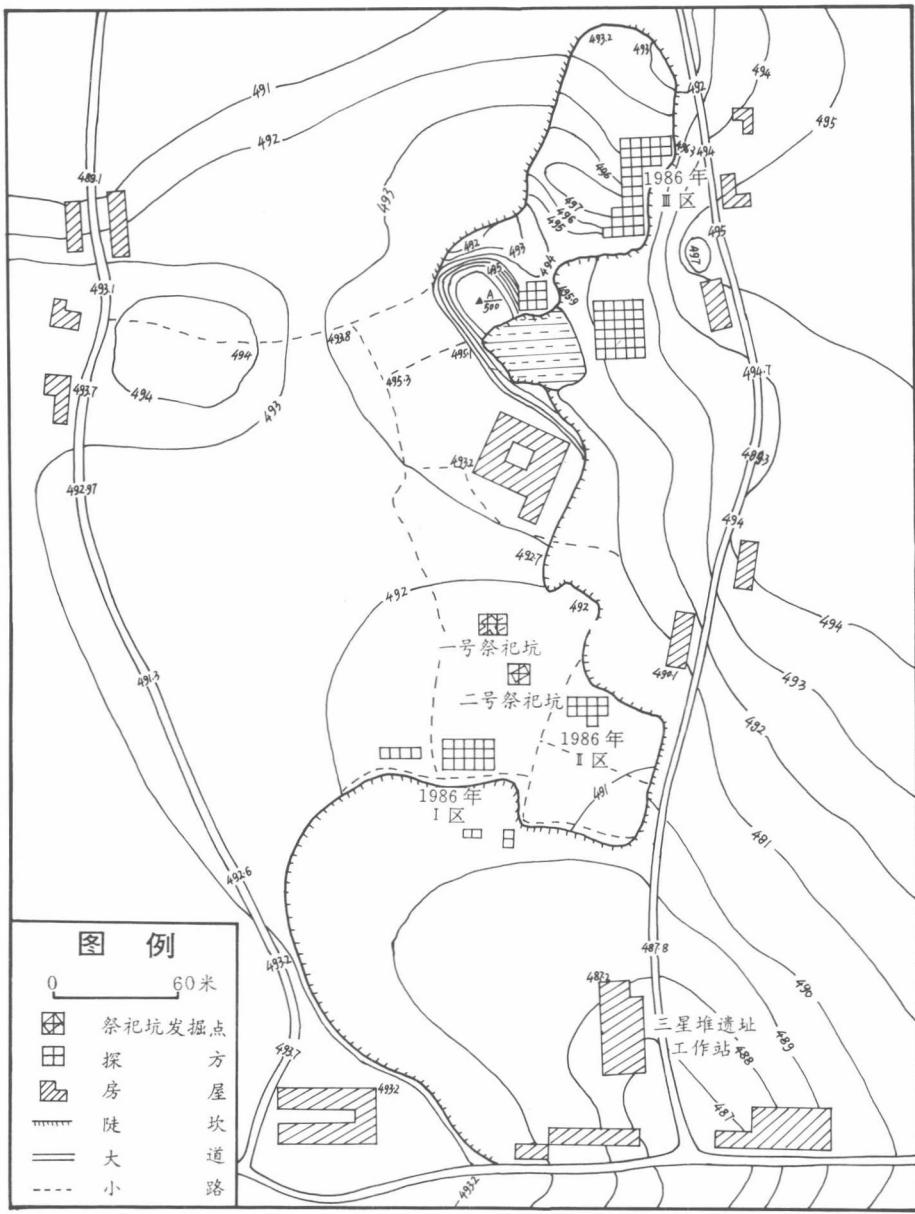
1986年7月18日，砖厂职工在三星堆第二发掘区取土时挖开一号坑东侧一角，从坑中取出玉石器10余件^[9]，立即报告了住在砖厂整理考古资料的省文物考古所田野考古队人员。经现场调查，认为出土文物十分重要，估计这里是一个大型祭祀坑。原来发现的两处土坑，此时看来也可能与祭祀有关。考古队将发现的情况立即上报主管部门，并经请示同意，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一号祭祀坑（编号为86GS II K1）的发掘工作从7月18日开始，至8月14日结束。

在结束一号祭祀坑发掘工作的当天，砖厂工人又在一号祭祀坑的东南约30米处取土中，挖开二号祭祀坑南角，暴露出铜头像1件，遂将其掩埋，隐瞒并封锁了消息，至8月16日下午，才将发现情况报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队人员。于是，又接着进行了二号祭祀坑（编号为86GS II K2）的发掘工作。8月20日开始发掘，于9月17日结束了野外工作。

[8] a. 1988年至199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先后对三星堆遗址东、西、南三面城墙进行试掘，已初步确定城墙的结构、年代、夯筑方法等问题。

b. 陈德安、罗亚平《早期蜀国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9] 为了将砖厂工人挖出的器物与正式发掘的区别开，我们在编号时，将砖厂工人挖出的器物在器物编号前加“0”表示，如“K1：01”等。



图四 1980~1986年发掘区及一、二号祭祀坑发掘探方分布图

1987年，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将砖厂从遗址内迁出。同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将三星堆遗址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负责该遗址的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1988年，国务院将该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二号祭祀坑是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教局联合发掘的。整个发掘工作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陈显丹二人负责，陈德安任发掘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文超、戴福森、戴堂才、戴兵、敖金蓉、郭汉忠，广